

论绥德师范学校整风中习仲勋的求实精神

黄凤凤

(陕西省榆林学院)

摘要: 1943年习仲勋同志在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整风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原则,扭转了学校整风运动的错误局面,使学校在党的领导下健康发展。这段历史是革命前辈给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应该认真学习这段历史,汲取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 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 求实精神 整风运动

1943年习仲勋同志在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绥师)整风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原则,坚持到学校进行实地调查,从而纠正了“左”的倾向,扭转了学校整风运动的错误局面,挽救了学校,也为陕西省绥德公署整风运动的正确开展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这段历史能使我们更加坚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好地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绥德师范学校师整风的复杂状况

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是一所有着深厚红色文化底蕴的学校,创立于1923年5月,原名为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34年秋,更名为“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接办后,改称“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简称“绥师”)。1924年夏,李子洲同志出任学校校长。李子洲(1892-1929),陕西绥德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被称为西北的李大钊。

1940年绥师被国民党分裂,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受国民党的蛊惑前去响水伪绥师和镇川的伪米中执教和读书。留下来的部分老师和学生,由于过去所受国民党反动教育的影响很深,再加上当时浓厚的封建意识,许多人认为共产党、八路军势力小,装备差,没有钱,成不了大器。对共产党、八路军种地、纺线、拣粪很看不惯,有些人甚至还把前途与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边区政府接办绥师后,为了充实师资先后派杨滨、欧阳正、韦君宜、郭琦、于行、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到绥师任教。大量新干部的涌入,带来了新鲜血液,营造出新气象,同时也为“审干”带来了难题。

1943年春季刚开学,校长霍仲年、训育主任刘宪曾和教员汤殷若同赴延安参加边区政府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决定由教务主任丁子文代校长,陈士斌老师代教务主任,余峥老师代训育主任。但有人对这个决定不满,在4月7日(农历的三月三,绥德合龙山庙会,热闹非凡)夜里在校园操场贴出了一张小字报,在当时学生用的麻纸作文本中撕下来一张双页纸,用毛笔竖写的,内容的大意是:我们一致拥护并坚决要求,杨典先生任教务主任,余峥先生任训育主任。要求学校一定答应我们的要求。既不署名,也无日期,当时称为的“黑头帖子”。

学校组织专人追查,一点线索也没有发现,却陆续又发现了几张张小字条,有的放在同学宿舍的桌子上,有的夹在同学的书本中,其中一张纸条的内容是:“XX吾儿,你们都是共产党员,三日之内,要你们的狗命!”。学校党组织据此怀疑有国民党特务在校内潜伏,因此,学校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学校选派了一批可靠同学,拿着童子军棍,每晚在校内的各个行人要道,派人秘密站岗,严密监视。

追查此事未果,又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件,杨典老师在宿舍里“被打”。杨典老师是国文教员,课教的很好,比较受学生欢迎,

他住在校内一间平房。差不多每个礼拜六晚上,都有许多同学到他房里听他讲故事,房子里挤的满满的,有的人进不了房,就在门口、窗下站着听。据他自己讲,那天晚上同学们离开后,他坐在临窗桌子前的椅子上看书,桌子上点着麻油灯,忽然从窗外飞来一块石头,冲破窗纸,打在他胸膛上,打得很重、很痛。第二天早上学校负责同志前往探望,杨典老师躺在炕上,窗纸有个大破洞,桌子上放着拳头大的一块石头,他还揭开衣服让大家察看伤处。杨典老师“被打”的消息,象开了锅的水,很快在校内沸腾。

绥德师范因为前述两起案件,成为反奸肃特的重灾区,自然也是“抢救”的重点。其推理逻辑是,绥德分区由共产党接收时,有相当大一部分国民党省立师范的教师留下来工作,这批教师中暗藏了一个特务系统,这个系统发展了一批学生特务,特务范围在绥德本地学生中间。

经地委批准学校全部停课,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分班、分组开会、坦白、交代、检举、批斗、追踪、审查。在两三个月的批斗、逼供、诱供下,许多同学把过去对八路军、共产党不理解所说的错话,说成是特务破坏;有的把生活中的种种失误,如多用了一点水,撒了一点饭,背粮时袋子破了撒了一点米等等,都说成是特务破坏;有的女同学甚至把和进步同学谈恋爱说成是“美人队”施的“美人计”。坦白交代出“三青社”“复兴社”等国民党特务组织。更为离奇的是,还查出一个所谓的“特务美人计”组织。说这个组织的领导是一位语文教师,队员是许多女孩子。一个女生写了一篇《我的堕落史》,登在了地委《抗战报》上,由此引起许多十一二岁的“小特务”踊跃投稿,而且稿件越写越离奇,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11岁、10岁的,一直到发现6岁“小特务”!部分教师和学生被当作重点审查对象,逼供信、假坦白之风盛行。一时间,“特务”如麻,草木皆兵,人人自危。连在学校领导整风运动的党总支书记何仁仲等同志也“坦白”了,全校师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1943年9月22日的《解放日报》报道称:绥师“已有160余人觉悟悔改”,“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280余人,被揭发者190余人”,“一个14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16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的武器。”在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中,最后竟挖出了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事情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二、习仲勋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原则力挽狂澜

1、发现运动乱象,及时向中央汇报

面对绥师的混乱状况,习仲勋心情非常沉重,他心中清楚审查干部,纯洁队伍的重要性,但对绝大多数被“抢救”成特务和嫌疑分子的结果,习仲勋充满疑惑,内心极度不安,他曾对人说:“这

么小的女学生，又没有出去过，怎么会当了特务呢？”①

经历过陕甘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的惨痛教训，习仲勋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着切肤之痛。当前的混乱现象，让习仲勋异常焦虑和不安，他越来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强调“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为了从源头上遏制“左”倾错误的发展，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习仲勋不顾个人得失，毅然打报告给西北局和党中央，如实反映绥德地区的情况，建议中央及时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

2、贯彻中央精神，尽快挽回局面

由于习仲勋的报告，绥德的审干运动也同样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7月，毛泽东约请绥德分区专员袁任远谈话了解情况，反复强调说：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来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8月29日西北局关于绥德反特斗争发出指示，强调：“不要多逮捕人，尤不可多杀人，少数需枪毙者，亦暂时不枪毙。”②10月9日，毛泽东在一份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③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审干工作的最新指示传达到绥德，使“抢救运动”及时刹车，也为习仲勋领导下的地委及时纠正“左”的错误，搞好甄别，给予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习仲勋领导绥德地委放开手脚，全面开始甄别平反。习仲勋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甄别纠错。

首先加强党对学校的领导。在发现绥师问题后，习仲勋即派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生到绥师蹲点，后来又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同志担任绥师的党总支书记，牢牢掌握运动的主动权。在新组建的校党总支会议上，习仲勋认真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审干工作的指示，对照检查了学校在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了甄别平反的方法、步骤。并特别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主观，不要轻信口供。为了开展好绥师的甄别平反工作，习仲勋决定在地委和学校党总支领导下，专门成立了一个甄别工作班子，全面负责绥师的甄别工作。

其次查清“黑头贴子”和“杨典被打”两个案件。习仲勋指令地区公安局局长——有“红色福尔摩斯”之称的布鲁调查绥师发生的两个案件，布鲁请人对小字报的笔迹进行了比对，亲自用石头击打自己试验，调查、分析后，最终查清了案件是教员杨典为个人入党相当官而自导自演的“苦肉计”，从而揭开绥师作为特务窝点的谜团，为后续的甄别平反工作取得重大突破。

再次深入调查研究，对“有问题”的逐一甄别。习仲勋先后把齐心、姚学融、白树吉等党员和学生叫到地委亲自谈话，了解情况。当齐心汇报绥师的情况时，习仲勋提醒说：你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应该对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偏差进行抵制。“如果这样下去，连你们几位也会被怀疑”，希望他们认真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做学生思想工作，帮助地委扭转假坦白造成的混乱局面。④经过甄别班子的逐一甄别，甄别的结果是绥师一个特务也没有。

最后召开大会，安抚人心。为了挽回“抢救运动”在学生家长和社会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习仲勋和绥德地委决定让绥师党总支，把分散在各县的学生家长请到学校，一面征求意见，一面宣传党的政策，做安抚人心的工作。

3、向被冤枉同志道歉，做自我批评

在甄别纠错过程中，习仲勋同志还主动作自我批评，向在运动中被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他对同志们说：“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⑤此外，他还亲自找受到不公正对待

的同志谈话，帮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对于习仲勋跟自己的谈话，田方、殷参等同志在晚年回忆时还记忆犹新，言语之间，对习仲勋充满了感激和钦佩之情。

4、认真学习文件，反思历史教训

甄别平反工作结束后，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绥德地区高级干部学习小组，由习仲勋、徐向前负责。重点学习中央编印的《两条路线》的历史文献读本。徐向前、何长工、习仲勋等同志分别介绍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各苏区的影响和危害。习仲勋着重介绍了刘志丹、谢子长创立陕甘苏区和陕北苏区过程中艰苦斗争的经历，特别讲述了“左”倾路线的制造者制造的错误肃反，给根据地带来的严重后果。通过学习，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左”倾思想的危害和教训，坚定了抵制错误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工作路线和方法的决心。

三、历史思考与启示

（一）思想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绥德的整风中，习仲勋同志反复讲，我们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得失，冒着政治风险写报告给党中央和西北中央局，如实反映绥德地区发生的情况，建议中央及时制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在甄别平反时，习仲勋秉持了客观、公正的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并亲自领导我校的甄别平反工作，迅速结束了绥师的“反特斗争”。

（二）政治上：坚持“党的利益第一位”

习仲勋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虽历经磨难而痴心不改，始终坚持“党的利益第一位”，与党中央保持了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无论是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岁月，还是错误肃反中身陷囹圄的绝望处境，都保持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永远跟党走的决心。当整风运动出现曲折复杂的局面时，他注重调查研究，谨慎决策，力求减少失误。他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党负责的工作态度，积极如实的反映情况，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正确工作方法，都充分体现了习仲勋同志既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又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相信党、依靠党中央的优良品质。

（三）作风上：敢于担当勇于自我批评

领导干部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难免会犯错误，尤其是一些探索性的工作。但是在认识到错误后，要有修正错误的政治勇气，以及敢于担当的道义精神。

正是习仲勋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始终密切联系群众、时刻关心群众、一心为了群众，才根本上扭转了绥师的状况，挽救了绥师。也验证了党的思想路线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的。

参考文献：

[1]白治民谈话记录，1996年5月13日。

[2]《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文件汇集之三》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75页。

[4]绥德师范学校校史丛书编委会：《峥嵘岁月》，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页。

[5]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8页。

姓名：黄凤凤（197704），性别：女 民族：汉 籍贯：陕西省子长县 学历：本科 单位：榆林学院陕西省榆林市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